

司命千里 ——宋朝司理参军制度

贾文龙

(河北大学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 宋初设置司理参军,是赵宋一代地方司法权整顿的重要措施,亦是地方属官体制改革的最重要手段。司理参军作为刑狱官的专职化,是宋代“狱贵初情”的重要表现,极大促进了宋朝州级司法“特于详断之初”的科学化;司理参军的设置,形成了“鞠司”,亦使宋代司法参军检法职能专职化,形成“谳司”。二者作为曹官系统与推官、判官所在幕职官系统类似“判司”职能的环节化,共同完成了宋朝独具特色“鞠谳分司”制度的建构。

关 键 词: 宋朝; 司理参军; 鞠谳分司; 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670(2015)03-0055-05

司理参军是赵宋一代新设立的重要的州级属官,目前学术界主要从政治制度角度对这一职官进行了研究。龚延明先生考证了司理参军的职源与沿革、职掌、品位、编制、简称与别名,为研究者提供了必要参考^①;苗书梅先生详细考察了宋代州级各种属官职源、设置状况与主要职能^②;程彩利从官制史角度对宋代司理参军进行了详细研究,探讨了其职能种类、编制选任、官品俸禄、考课转任、监督奖惩等各方面的管理制度^③;戴建国先生在论述宋朝刑事审判制度时也涉及司理参军的职能问题^④。但这些成果受研究重心所限,均未对司理参军展开详细论述,因此本文从法律史角度对宋朝司理参军司法职能进行专题研究。

一、州委之生杀:宋朝司理参军制度的源起

唐末五代以来,随着藩镇割据的发展,使盛唐以来良好的司法传统几丧失殆尽,而五代乱局中司法体系更是进入最混乱时期。五代时期的司法权力脱离统一控制,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出现了弊政。中央方面表现为中央政府失去了死刑案件的检察权“五代用兵以来,藩侯跋扈,率多枉法杀人。朝廷务行姑息之政,多置不问,刑部按覆之制遂废。”^{[1]1474}五代地方

司法弊政表现为:军府中掌司法的武职将校“马步司”已经成为事实上州一级的司法部门。五代军人掌司法产生的严重后果是酷刑的滥用,经常“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即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军吏因之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数”^[2],从而使五代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最混乱和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首先对地方司法权进行限制,“定大辟详覆法”^{[1]1443},把死刑执行的复核权收回中央,令“诸州自今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3]63-64}。宋太祖整顿地方司法权的最重要措施是新设专理刑狱的曹官,他对五代司法弊政有着深刻认识“五代之马步军都虞候判官也,以牙校为之,州镇专杀,而司狱事者轻视人命”,^[4]“太祖虑其任私,高下其手”^[5],于建隆元年(960)诏“两京军巡、诸州马步院判官合吏部流内铨择选人,无遗省听减两选补之,始用文吏也。”^[6]开宝六年(973)废马步院建司寇院“先是,诸道州府任牙校为马步都虞候及判官断狱,多失其中。秋七月壬子朔,诏罢之,改马步院为司寇院,以新及第进士、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者为司寇参军。”^{[3]305}“命子城院毋得收系,改军巡为司寇,始以士人为参军,天下巨镇得置左右两院者凡十有六。”^[7]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又做出更司寇为

收稿日期:2014-11-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宋朝地方司法结构变革与治理效能研究”(11CFX010);教育部基地项目“宋代地方法制研究”(10JJD770009)

作者简介:贾文龙(1974—),男,河北围场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宋代法制史研究。

①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47-548页。

②苗书梅《宋代州级属官体制初探》,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程彩利《宋代司理参军制度研究》,河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戴建国《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研究》,载《文史》第3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司理的改革:

诏改司寇参军为司理参军,以司寇院为司理院,令于选部中选历任清白,能折狱辨讼者为之,秩满免选赴集。……寻又诏诸州察司理参军有不明推鞠,致刑狱淹滞,具名以闻,蔽匿不举者罪之。^{[3]466}

司理参军是宋朝唯一新设的州级属官,而其设立的本意就在于负责刑狱,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宋初地方司法能否实现新的地方司法秩序,因此宋太宗很重视司理参军的选任问题。太平兴国八年(983)又下《司理判官于邻近州府选充诏》:“诸道州府司理判官,比来悉以牙校为之,在其本部必有亲党,自今各于邻近州府选强明历事者充。”^{[3]550}太平兴国九年(984)诏书中明确指出司理参军的职能在“专于推鞠”:

司理参军,专于推鞠,研覆情实,尤在得人。如闻诸道多阙此官,盖吏部拘以资叙,难为注拟。自今应有阙处,宜令本州于见任、前任簿尉判司内,选择明敏有官业者充,秩满当与升奖。其罢软不任职者,便可选官代之。^[8]

宋太宗秉信“法吏浸用儒臣,务存仁恕”^{[9]496}。随着科举取士人数增多,“太平兴国时,始用士人为司理判官”^{[1]1444}。宋太宗认为“郡司理,古小国之秋官也。比来佐僚皆用郡吏,朕重惜人命,乃选士流。”^[10]雍熙二年(985)八月,太宗又谓宰相曰“朕于狱犴之寄,夙夜焦劳,比遣使臣按巡诸道,盖虑或有冤滞耳。因思新及第进士为司理参军,彼于法律固未精习,宜令诸州长吏视其不胜任者,于判司、簿尉中两易之。”^{[3]597}“太宗尤严牧守之任……令阅属部司理参军,廉慎而明于推鞠者,举之。”^{[9]3740}可见,经宋太祖和太宗两朝的努力,宋朝大概用20多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司理参军制度。

宋朝后继续统治者一直坚持州县亲民官才有司法权,地方驻扎军队不能断罪“非州县长官不许受辞……非亲民不许科决杖罪,而镇寨敢自专推司辄自讯囚,荆杖代用藤条,睹望锻炼,备极荼毒……前后禁约科罚惨酷条令大字镂板,行下诸路郡邑,揭于通衢。其有犯者,必罚无赦。”^{[11]刑法2之129}当然,宋朝司理参军是十分重要的地方亲民官,赵宋一代,始终都在维护司理参军的司法权力。

北宋被金灭亡后,仓促建立的南宋在恢复“祖宗家法”的过程中,官僚又重新提起设立司理参军的初衷。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吏部郎中汪应辰奏称“国家累圣相授,民之犯于有司者,常恐不得其情,故特致详于听断之初。”^{[12]卷217《论刑部理寺狱决当分职札子》}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臣僚上言“狱贵初情……大辟之囚……州狱一成,奏案遂上,刑寺拟案,制之于法,则死者不可复

生矣。”^{[11]刑法3之78}司理参军作为“专于推鞠,研覆情实”的刑狱专职官,“特致详于听断之初”与“狱贵初情”正道明了最初设立此项职官的制度设想。

宋沿袭唐制,规定县无权处置杖刑以上的刑事案件,“诸犯罪,杖以下,县决之;徒以上,送州信断”^{[13]327},所以宋代“凡州郡之治,非兵戎则尽农事、狱讼、简书也”^[14]。对于州县在政治体制中的职能分工,宋人曾言“祖宗之规模在于州县,州委之生杀,县委之赋役。”^[15]而司理参军专职刑狱,执掌审讯权,正是“委之生杀”最重要的属官设置。

二、专鞠狱事:宋朝司理参军的职能运行

宋朝司理参军是地方刑事审判的重要官员,宋太宗时规定司理判官的职务是专于刑狱“司理参军,专于推鞠,研覆情实。”^[16]司理参军的办公衙署为司理院或司理厅,全国大府、大州共16处,可设置左、右两所司理院。有的小州,省去州院,只设一所司理院^{[11]职官47之74}。州衙内的“司理院”下设监狱,管辖推院、杖直、狱子等吏人若干名。司理处理的案件以盗贼的重大刑案为主,县尉捕盗后,则送州衙的司理院,再由司理参军进行治狱推鞠^[17]。大辟犯和劫盗在逮捕归案之初要先进行刑讯,“大辟窃盗捕至之初,例于两腿及两足底,辄讯杖数百,名曰入门杖子,然后付狱”^[18]。司理院下设监狱,“诸狱并一更三点下锁,五更五点开锁”^{[1]1454}。

为保证司理参军集中精力用于司法事务,宋太宗时规定司理不得兼职。雍熙三年(986)诏“司理,司法不得预帑藏之事。”^[19]端拱元年(988)又诏“诸道州府,不得以司理参军兼莅他职。”^{[3]647}真宗时也重申“诸州勿遣司理参军监莅场务”^{[3]1721}。南宋规定,派充司理参军,一定要“试中刑法”或者曾经担任过这一职务的人:“中兴,诏曹掾官依旧,惟司理、司法并注经任及试中刑法人……司理例以狱事为重,不兼他职。……嘉定中,申明年满六十不许为狱官之令,仍不许恩科人注授。”^{[9]3976}

宋仁宗《禁狱官辄预游宴送迎诏》规定诸州有徒以上重要罪犯,狱官不得离开监狱“天下狱有重系,狱官不得辄预游宴、送迎。”^{[3]2705}“诸州有徒以上囚禁(原注:寄禁非)而狱官辄出谒及见宾客,并见之者,并依路分兵官将副法。”^{[20]33}“诸州有大辟,当职官先审情实,然后付狱。狱官不得赴宴会及出城送迎。”^{[20]164}同时禁止于司理院按习宴乐^{[3]1849-1850}。

“推鞠大辟之狱,自检验始”^{[11]刑法6之7},对犯罪现场的检验最重要的是对受害人身体伤迹的检查,轻则验伤,重则验尸,这可以确定自杀还是他杀及伤情严重程度,对确定案件性质、量刑十分重要。由于要审理狱案,复察案情,所以司理参军还专门负责本州涉案

的人证和物证的检验事务。宋代地方命案的检验官主要是县尉与司理参军,司理是法定的州检验官。咸平三年(1000)十月《杀伤公事检验诣实诏》规定“今后杀伤公事,在县委尉,在州委司理参军,如阙正官差以次官,画时部领一行人躬亲检验,委的要害致命去处;或的是病死之人,只仰命官一员画时检验。若是非理致命及有他故即检验毕,画时申州,差官覆检诣实方可给与殡埋,其远处县分先委本县尉检验毕,取邻近相去一程以下县分内牒请令尉或主簿一程以上,只关报本县令佐覆检,独员处亦取邻州县最近者覆检,诣实即给尸首殡埋,申报所录州府不得推延。”^[11]《刑法6之1》《天圣令》又规定“诸地分有死人,不知姓名、家属者,经随近官司申牒推究,验其死人。委无冤横者,当界藏埋,立榜于上,书其形状,以访家人。”^[13]³¹¹关于确是“病死之人,只仰命官一员画时检验”的规定,现存北宋陕州官方墓地漏泽园的出土M0370墓志砖可资证明司理为检验官:“司理院头子抬到澶州兵士祝信,十一月初四日葬埋讫。”^[21]南宋延续了这一规定“诸验尸,州差司理参军,(原注:本院因别差官,或止有司理一院,准此)县差尉。”^[20]⁷⁹⁹

司理参军主要负责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如王平为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市)司理参军时,有一杀人夺财案。一女骑驴单行,遭盗杀害于田间,衣物被抢走,驴被附近一户人家收系,胥吏察访得驴,指田旁家为杀人凶手,审问长达四十天,田旁家“认收系驴,实不杀女子”。王平知道案情有疑,上报知州,却遭到喝斥,令其迅速结案,王平坚持己见,最后获得真杀人者。知州谢曰“微司理,向几误杀人。”^[22]

宋祁之父为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司理参军,精思于讯鞠爱书之间,“州界有行商,部辄重,夜径泽中,将宿佛祠,值奸人前杀群僧。廷内狼籍,商人入寺,蹀其血,乃觉,因轻骑逃去。晓逢逻者,见衣履有污,执以为贼。传考数狱,商遂自诬”,宋祁之父心中疑问“是辈操奇赢,举千百计,胡怨而蹈死耶?”没有轻下结论,后经人举报,终于破案^[23]。

张文规为英州(治今广东英德市)司理参军时,“真阳县民张五数辈盗牛,里人胡达、朱圭、张运、张周孙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盗散走,独张五拒抗不去,达杀之而取其资。盗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县。县令吴邈欲邀功,尽取达、圭以下十二人送狱,劾以强盗杀人,锻炼备至,皆自诬服。圭、运二人瘐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规察囚辞色,疑不实。一问得其情,又获盗牛党以证,狱具。胡达以手杀人杖脊,余人但等第杖臀而已,圭、运乃无罪”^[24]。

胡向为袁州(治今江西宜春市)司理参军时,“有盗七人,皆当死,向疑其有冤,乃留讯之。则二人者,果不同谋,始受其佣,而中道被胁以行”^[25]。

李彤为万州(今属重庆市)司理参军,“有篦人之脉者,提点刑狱视之,疑且怒,欲以骨折论”。“太守畏不敢辩,君(李彤)提伤者以告曰‘折则上下不相属,今举其上而下不少曲,非折明矣。’使者无以胜,卒轻之。”其摄督邮(录事参军)时“有三人谋杀一人者”,白于守曰“一人死,安可戮三人,坐谋首可也。”守不听,言语有斥责之意,李彤持之益坚,请于提点刑狱,且曰“某宁解印绶去,安忍妄杀人,求顺太守意邪!”后上报朝廷,只处罚一人^[26]。

孙观国为彭州(治今四川彭州市)司理参军时,“兵夜直,其妇死于家,兵就鞠,惨楚将诬服。公疑访于外,乃得妇奸,尝与夫反目,知为自戕,兵始得脱”。另有一案,“有与娼狎,而或约同死。娼毙,其人殊,舆至狱,槽不能白。一日牵其衣,见字股间,具道所以为者,谪笞之”^[27]。

因为司理参军负责一州之内所有刑事案件的审讯,州狱一成就决定判决的走向,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生杀大权,“州郡之狱,所系甚重,刑名有出入之殊,人命有死生之判。流徙而下,其事实繁,苟推鞠之际,一失其平,则冤抑之民,何所赴诉?然则狱官所系,顾不重哉”^[12]卷217《乞慎择狱官奖掖有功者札子》!故当时人说“凡县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则平之于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于守;守视其事之小者立决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弃之杀之。故曰:守之责不若理官之重。”^[28]所以时人这样评价司理参军“狱掾者,千里之司命也。”^[29]

三、新官与旧臣:司理参军制度 对宋朝地方司法模式的影响

宋朝州级司理参军的设置带来了地方审判模式的改变,形成独具特色的“鞠谏分司”制度。

宋朝司理参军“专于推鞠,研覆情实”,办公衙署为司理院或司理厅,下辖监狱,配置推院、杖直、狱子等吏人,因此成为“鞠司”,其职能主要在于履行审讯权。

宋朝司理参军的设置,使司法参军成为“谏司”。唐朝时,司法参军称为“法曹”,职能广泛“司法参军掌律、令、格、式,鞠狱定刑,督捕盗贼,纠逖奸非之事,以究其情伪,而制其文法。赦从重而罚从轻,使人知所避而迁善远罪。”^[30]宋初司法参军还享有审讯权:“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参断之。”^[9]⁴⁹⁶⁷前期以后,司法参军只掌“议法断刑”^[1]⁵⁷²,不再享有鞠狱权和督盗贼的职能,且“诸州法司吏人,只许检出事状,不得辄言予夺”^[31]²⁵⁷⁶,即在司理参军等审理案件后检出适应的法律条文,以供判决时参照使用,但不许提供判决建议,因此称为“谏司”。

宋朝州级司法参军作为检法之官,负责保管中央

下达于地方的各种诏令:“诸被受手诏,以黄纸造册编录。并续颁诏册并于长官厅柜帕封锁,法司掌之,无法司者,选差职级一名,替日对簿交受。遇有检用,委官一员,(原注:州委司法参军)监视出入。”^{[20]334-335}因此,在案件录问后需援法定罪时,由负责检断法律的司法参军根据犯罪供审事实,将有关法律条文摘录出来供长官定罪量刑使用。

谏司具体检法顺序是律、令、敕、例。《宋刑统》引后唐长兴二年(931)八月的敕条规定“今后凡有刑狱,宜据所犯罪名,须具引律、令、格、式,逐色有无正文,然后检详后敕,须是名目条件同,即以敕定罪。敕内无正条,即以格文定罪。格内又无正条,即以律文定罪。律、格及后敕内并无正条,即比附定罪,亦先自后敕为比,事实无疑,方得定罪。”^[32]后“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9]4963},敕正式取得律的优先地位。由于检法阶段很容易影响长官的决断,因此当时法律规定法司只能检出法令,不能提供参考意见,南宋重申“诸州法司吏人,只许检出事状,不得辄言予夺。”^{[31]2576}

宋朝司理参军的设置,改善了宋朝州级的双系统属官司法职能的相互关系。唐代中后期各藩镇自辟属官,“文武将吏,擅自署置”^[33],“始置判官二人,支使二人,推官一人也”^[34],“判官而下,皆自延请”^[35]。由此形成州级双系统属官制:一是原有的中央政府任命的录事、司法、司户诸参军,称为州曹官;二是后来出现的由藩镇长官任命的判官、推官,称为幕职官。随着割据政治的发展,在唐代后期以来的行政体系中,幕职官成为地方政务的实际主持者^[36],州曹官的实际地位低于幕职官。宋朝建立后,承认了唐末五代以来州郡藩镇化的政治格局,在州级继续实行双系统属官制。在收回了幕职官任命权的前提下,承认了幕职官作为知州、通判佐助的政治地位,使之成为治理地方政务的州级政府正式官员。宋朝“判官、推官掌受发符移,分案治事”^{[11]职官47之11-12},办公地点称为金厅,幕职官在协助本州正副长官处理政务公文,“斟酌可受理、可施行、或可转发、可奏上与否”^[37],幕职官成为知州和通判的助手。

唐末五代以来,幕职官与州曹官二者互不隶属而并列存在,幕职官是“藩侯跋扈,率多枉法杀人”的司法执行者,因而幕职官重于州曹官。宋朝设立司理参军后,将二者整合在州级行政体制中,州曹官虽仍轻于幕职官,但司理参军掌刑事审讯权,司法参军掌检法权,州曹官负责的司法职能已大大加重,幕职官的地位虽仍高于州曹官,但不再执掌生杀大权,主要负责“拟判”环节。《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幕职官拟判的情况“金厅所拟,已尽情理,照行”^{[38]227},“陆兼金所拟,固已曲尽其情矣”^{[38]229},“本州金厅之所

断”^{[38]298}。在盛荣与盛友叔侄争屋业案中,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市)通判吴革就肯定了推官的拟判意见“察推谓予夺田地之讼,所据在契照,所供在众证,此说极是。”^{[38]189}《侄假立叔契昏赖田业》案署名建金所拟^{[38]146},《兄弟争业》为“本县所断,金厅所拟”^{[38]173},《违法交易妄赎同姓亡歿田业》署名金厅所拟^{[38]319},《假宗室冒官爵》也署金厅所拟^{[38]400},另《对移贫吏判》中记载“本司已追吴杰赴司,押送司理院根勘到上件情节,寻呈金厅官书拟因依,欲将吴杰决脊杖七十,于原配州上加刺配一千里。”^{[38]56}以上这些例子集中体现了幕职官“拟判”职能的实际运作。此外,《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还有些判例署名“拟笔”,但未言是何属官所为,如《父官虽卑于祖祖子孙众而父只一子即合从父限田法》《出继子不肖勒令归宗》《命继与立继不同》《伪作坟墓取赎》《共帐园业不应典卖》等,应该也有部分为幕职官所拟。另如宋孝宗时陈希点为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市)观察推官,丘密为知州,“屡以职事争辩,丘公或凭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霁,执论如初,至于再三,竟不能夺。自尔,公所书拟,望而许之”^[39],也说明幕职官常担任拟判的工作。从这个角度讲,宋朝州级幕职也可以称为“判司”。

宋朝司理参军设立之后,宋朝地方刑事审判模式可以分为四个环节:司理参军负责审讯,司法参军负责检法,判官或推官负责拟判,最后知州定判。因此,宋朝的州级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审权与判权的分离,这在司法隶属行政的古代中国是独特的制度设计。

结语

总而言之,宋朝州级司法制度一方面受到唐末五代历史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唐末五代政治体制和宋初皇帝个人因素的影响,带有时代的印痕与政治设计者的偏好。宋朝司理参军的设立,促使司法参军专职于检法工作,因此在州曹官内部实现了鞠司和谏司两个子系统的分离,形成了“鞠谏分司”制度。而州曹官的职能分化,进而又促使幕职官专职于拟判工作,实现了审讯、检法、拟判权力的环节化,完成了宋朝州级审判的鞠、谏、判三司权力分离制度。

宋朝州级审判模式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20世纪70年代,徐道邻先生指出“整个的说来,宋朝——尤其是北宋——的司法制度,可以说是已经达到十分成熟的阶段”^{[40]104},“就司法制度而言,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黄金时代”^{[40]128},“中国传统法律,到了宋朝,才发达到最高峰”^{[40]88}。这些观点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法史学者,“鞠谏分司”制度被公认为中国传统律法制度的最高峰。而宋朝司理参军的设置,正是这一制度高峰形成的初始动力。

参考文献:

- [1][宋]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清]赵翼. 廿二史札记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478-479.
- [3][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4][宋]王栻. 燕翼诒谋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4.
- [5][宋]王辟之. 渑水燕谈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59.
- [6][宋]李攸. 宋朝事实[M]. 卷9.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 [7][宋]张栻. 新刊南轩先生文集[M]//宋集珍本丛刊本: 第60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85.
- [8][宋]佚名. 宋大诏令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606.
- [9]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0][宋]刘克庄. 刘克庄集笺校[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4600.
- [11][清]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 [12][明]黄淮. 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13]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M]. 天一阁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 校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4][宋]刘敞. 彭城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1096册. 卷32.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
- [15][宋]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208.
- [16][宋]钱若水. 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171.
- [17]刘馨珏. 明镜高悬: 南宋县衙的狱讼[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6.
- [18][宋]陈襄. 州县提纲[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602册. 卷3.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
- [19][宋]孙逢吉. 职官分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782.
- [20][宋]谢深甫. 庆元条法事类[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21]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北宋陕州漏泽园[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255.
- [22][宋]吴曾. 能改斋漫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69.
- [23][宋]宋祁. 景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1088册. 卷62.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
- [24][宋]洪迈. 夷坚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11.
- [25]杨奉琨. 折狱龟鉴校释[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8: 426.
- [26][宋]吕陶. 净德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1098册. 卷25.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
- [27][宋]李流谦. 澹斋集[M]//宋集珍本丛刊本: 第46册. 卷17.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 [28][宋]蔡襄. 蔡襄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513.
- [29][宋]程秘. 程端明公洛水集[M]//宋集珍本丛刊本: 第71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85.
- [30][唐]李林甫. 唐六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750.
- [31][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32][宋]窦仪. 宋刑统[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551.
- [33]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3895-3896.
- [34][宋]高承. 事物纪原[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920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 318-319.
- [35][宋]张方平. 乐全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1104册. 卷9.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
- [36]杨志玖, 张国刚. 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J]. 社会科学战线, 1984(1).
- [37]龚延明. 宋代官制辞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541.
- [38][宋]佚名. 名公书判清明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39][宋]楼钥. 楼钥集[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1810.
- [40]徐道邻. 中国法制史论集[M]. 台北: 志文出版社, 1975.

The Silicanjun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JIA Wenlong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Silicanjun constructed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ctify the local jurisdiction and also serv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of the local official's reform. As the professional prison official, the location of Silicanjun demonstrated that evidence was of high importance before a trial, which greatly improved the municipal-level court proceeding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situation of Silicanjun also pushes forward the separation of prosecution and trial.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silicanjun; separation of prosecution and trial; legal history